



我的书。从左到右，依次为2018年《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》、2021年《世间的小儿女》、2023年《在菜市场，在人间》、2024年《去有花的地方》、2025年《她乡》。

红人堂·陈慧 第5本书《她乡》诞生： 我一直在认真生活



在我获得了“菜市场女作家”的头衔后，被读者问得最多的问题有两个：第一，你是在平淡无奇的日常中找出写作的素材；第二，你笔下的人物是否都能对应现实生活里的具体的原型。

成为一个所谓的作家，原非我本意。从2010年冬天至今，我全部的书写，均不是刻意的寻找，而是偶然的得到。如果一定要给出答案的话，我只能说，我一直在认真生活——大凡认真生活的人，总能在别人忽略的角落里，捡拾到有意思的东西。

我在余姚梁弄镇菜市场摆流动小百货摊谋生的十八年里，至少接触了这个小镇上百分之八十的居民。我喜欢待在人群里，喜欢观察人，因为这个世界最迷人的，就是人本身。哪怕随机从人堆里扒拉出的一个外表平淡无奇的人，都会有专属于他自己的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。

相较粗线条的男人，我更乐于结交不同年龄层的女人。女人一旦走进婚姻，在光阴的推波助澜下，婆媳、夫妻、儿女、工作等大小问题就会像抓不完的虱子一样，间歇性地扰乱女人的日常秩序。

我随时切换身份和她们一起八卦，借出耳朵听她们吐槽，甚至充当狗头军师，给她们出谋划策。当我在键盘上串联起她们的故事时，我甚至会产生一种奇怪的错觉，仿佛我不再是我。我感受着她们的感受，决策着她们的决策——我，即她们；她们，就是我。

后来的某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种轻车熟路的代入感，与其说是写作者的敬业，还不如说是同性之间下意识的共情。

我的新书《她乡》划为“她们”和“我们”两个部分。

“她们”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小镇上，却各有各的身份，各有各的困顿：遭遇骗婚，终其一生都在代替丈夫“当家作主”的外省媳妇；间接拆散儿子媳妇、控制欲极强的旧式婆婆；在母亲受难时伸出援手，又坚决

不原谅母亲抛弃行径的女儿；拒绝送智障孙女去嫁人，“活一天，顾一天”的奶奶；意外破相，无法婚姻自主的山区少女；少年坎坷，幸得爱神垂怜的哑巴姑娘；单打独斗，中风后努力自救的中年女小贩；以及安居一隅、形影相吊却又怡然自得的中年离异女子。

生活于她们而言，时而似一方没有明确界限的阔地，时而好比一个无法甩脱的囚笼。她们命运内的爱与怨、龌龊与温暖，是普通女性群体最真实的切面。

“我们”都是我家族中的女性长辈、亲人、家人。她们距离我最近，是我最熟悉的参照物。

我写下“我们”的过程，既是让已逝世的人在文字中复活，又是在与不同时期的自己对话。

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中年，往事慷慨丰沛，不动声色地还原出我的来路。我之所以活成眼下这个样子，成了这样的一个我，和这些最亲、最爱的“我们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

没法说，岁月对女人是厚爱，还是薄待。世俗规定女人既要滴水不漏，又要海纳百川。她们有的提枪上马，勇往直前。有的左顾右盼，犹豫不决。她们在琐碎逼仄的缝隙尘埃间，一边挣扎，一边变老。她们织造出独一无二的生活，又被亲手织造出来的生活所牵绊。

她们坚韧、执着、良善、通达，是坚硬现实中的恒久微光。也就是这些个体的动人微光，指引着年近五十的我，有尊严地活着，活下去……



扫描二维码可欣赏全文

红人堂·郑炆和 《她乡》： 看见“隐秘的疼痛”

《她乡》主人公全是女性，故乡苏北农村的女性和现居地浙东山区的女性。

她们是如此的普通，没有祥林嫂的故事性，也没有李双双的时代性。但陈慧用细腻的笔触让她们进入了文学，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浪潮中的一朵浪花，让她们隐秘的疼痛和生活的韧劲被看见。

看到这些女性，我会想到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和曹禺笔下的繁漪。尽管时代和身份有天差地别，但令人悲哀的是，她们的疼痛本质是如此的相近。

我们曾把娜拉和繁漪的不自由和傀儡形象归咎于社会不让女性工作，她们没法经济上独立，以致失去了把控自己命运的力量。但《她乡》中的女性基本上不但自食其力，而且承担养儿育女的重任。可在婚姻中，她们照样个个遍体鳞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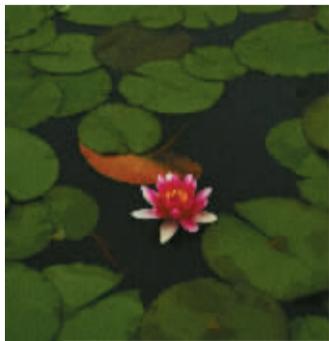
养母结婚好几年总是怀不上，喝偏方——童子尿，她说：“前后喝了两三个月，喝得我饭也咽不下去了，脖子上瘦得只剩下三根筋，走路来两条腿软绵绵的。”后来公公婆婆松了口，说领个孩子养，这才不折腾了。

4年后居然怀孕了，但生孩子的时候九死一生。时隔多年，当“我”问起她当时的感受，她说“我忘记了”。但她没有忘记自己的丈夫在医生面前的一跪。因为记着，所以不管后来丈夫有多么荒唐，她都守着这个家。

“她和养父的婚姻更多的时候是她一个人的独自修炼。婚后10年的不孕不育，她要修炼；丈夫沉溺于酒桌，她要修炼；最诛心的是养父此起彼伏的花心事，还是要她修炼。”当年生孩子时的一跪，成了她婚姻的支点。

而母亲和小姨同样也是靠支点维持着婚姻。当“我”离婚后，父亲和小姨父都劝我再找个人。但母亲和小姨的意见恰恰相反，因为她们自己“终其一生都在忍着皮开肉绽的疼痛”。

“父亲在我母亲眼里脾气差，心眼小，不讲理……数落到最后，‘他



顾家’，她用力地强调了这一点，脸上满是庆幸。”

“小姨娘很少在我面前说到姨父。一个初秋雨天，我们相向而坐。她低声地坦承了日子深处里那些点点滴滴的辛酸，泪水悄然落下。擦去眼泪，她依然笑着给我姨父盖上‘特别勤劳’的好人印章。”

这亦真亦假的“庆幸”和“笑”背后其实是善良女性太多的不忍和不得已。“她们习惯于把婚姻的完整性展现给亲朋好友看，并始终认为这是一种责任。”但她们身体和心灵真切地感到了疼痛，那种岁月带不走的疼痛。

而“我”的婚姻再努力找也找不到支点。《她乡》中的秋因和阿妮都可以看到“我”的影子。

丈夫形同虚设，和阴晴不定的婆婆同吃同住。“秋因害怕看到婆婆板着的脸，但除了这个家，她别无去处。每天中午她踏进家门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偷偷打量婆婆的脸；如果没有硬邦邦地板着，她不由得长舒一口气；如果明晃晃地板着，她便下意识地把自已站成一张薄薄的纸，尽量不占据老屋里的任何空间。”

当阿妮提出离婚后，村里的邻居来劝和，“谁的劝，阿妮都不听。她鼓足了勇气从寒冷刺骨的烂泥潭里爬上来，哪怕全世界都站在她的对立面，她也绝不重蹈覆辙。”

社会发展日新月异，但有些人的认知和思维还留在农耕时代，把几千年的偏见当真理，把女性的母性当软肋。女性的疼痛是社会的疼痛，无视这些疼痛，最终必将遭到反噬。时代就算叫不醒周朴园们，但终究会让更多的“她们”更清醒，更有力量。

